

《麻姑仙坛记》小字本考论

何佳佳

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 2025年12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2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月16日

摘要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 文章首先考证了《麻姑仙坛记》原碑湮灭的过程, 认为其应损毁于元代江西地区的战乱之中; 其次, 结合北宋时期对于小字本的接受及评价, 推测北宋中期或是《麻姑仙坛记》小字本广泛制作的重要时期; 最后, 以历代著录中所见小字本《麻姑仙坛记》为基础, 系统梳理了小字本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十类版本系统及其主要特征。通过研究, 本文认为《麻姑仙坛记》小字本的广泛流传, 是北宋时期“书如其人”品评观与金石学视角共同推动的结果。

关键词

《麻姑仙坛记》, 小字本, 版本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Small-Character Version of The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Jiajia He

School of Ar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Received: December 14, 2025; accepted: December 5, 2025; published: January 16, 2026

Abstract

Employing documentary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stele of The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concluding that it was likely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fare in the Jiangxi region of the Yuan dynasty. Secondly, by examining its reception and evaluation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it posits that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a crucial phase for the widespread reproduction of the small-character vers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small-character versions documented throughout history,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categorizes them

into ten distinct edition systems, outlining their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formed during transmission.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broad circulation of the small-character version of *The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was propelled by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the Northern Song evaluative concept that “the calligraphy mirrors the person” and the scholarly perspective of epigraphy.

Keywords

The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Small-Character Version, Edi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麻姑仙坛记》自大历六年(771)四月刊立于抚州南城后，根据大字原碑世间逐渐衍生出了《麻姑仙坛记》中字本与小字本系统。其中，中字本以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刻本最具代表，然据历代著录记载，学界普遍认为其系后世伪托之作，故本文不对其进行着重探讨。相较于此，小字本自欧阳修《集古录》评其“非鲁公不能书”始，历经宋、元、明、清受众多书法家、收藏家瞩目，逐渐形成了南城原刻本、越州石氏翻刻本及停云馆摹刻本等系统。鉴于小字本在版本源流、具体特征及其递藏情况上呈现出了极为复杂的脉络，下文结合了大字《麻姑仙坛记》，系统梳理了小字本系统的版本谱系。

2. 《麻姑仙坛记》原碑湮灭的再考证

关于《麻姑仙坛记》原碑(图1)的湮灭问题，历代文献著录或提及简略，或语义模糊不详，诸如“旧碑为雷所破”“旧石焚毁山中”“元季兵燹，流落人间”([1]: p. 157)等结论，虽为后世学者反复援引，却难掩其结论的笼统与逻辑上的空白。

大历六年(771)颜真卿撰书《麻姑仙坛记》后，据《南城县志》卷三“此碑初藏于麻姑山后藏于府库”([2]: p. 338)的记载，可证中晚唐时期原碑仍藏于麻姑山处。唐末五代时虽战乱频繁，然此碑未遭损毁。至北宋时期，李觏《鲁公碑》诗云：“他人工字书，美好若妇女。猗嗟颜太师，赳赳丈夫武。《麻姑》有遗碑，岁月亦已古。……唯恐此碑坏，此书难再睹。安得同宝镇，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时，莫教凡眼觑。”([3]: p.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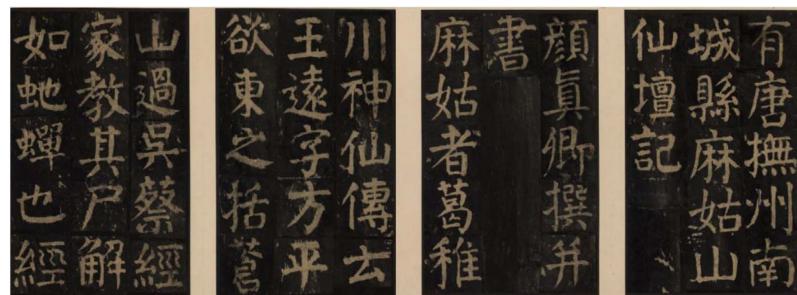


Figure 1. Song dynasty rubbing of the *Record of the Immortal Ma Gu's Pavilion* (Detail),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图1. 宋拓《麻姑仙坛记》(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诗中透露出了北宋时人唯恐原碑损毁，颜鲁公绝世书法再难重现的深切忧虑。结合曾巩《颜碑》所云：“碑文老势信可爱，碑意少缺谁能镌？已推心胆破奸充，安用笔墨传神仙？”([4]: p. 24)可知，北宋时期《麻姑仙坛记》虽为原碑但其“碑意”已有少缺。此外，官方为保护颜体真迹，特将其移藏于府库之中，若非重大祭祀不得示人。至南宋时期，历史文献中却记载了《麻姑仙坛记》碑石重返于麻姑山的事迹。周必大记载：“今年三月戊寅夜，山之仙都观大火，焚荡几尽。古杉星列，亦随飞烟，众碑皆断裂，杂瓦砾中，独公《坛记》岿然其旁。祝融回禄曲意护持如此，故并记其异，为后世忠臣之劝。十月甲子周某记。”([5]: p. 738)结合楼钥《攻媿集》所述：“颜鲁公，尝为抚州刺史，至今有南城县《麻姑仙坛记》。南城，今属建昌军，郡人祠公于仙都观中。……庆元六年，观遭火灾，祠宇灰烬，巨石皆毁裂，大钟亦融，液不可寻。而公之碑独俨然，人益敬之。太学宁君居麻姑下，下与观相望，慕公之为人，以私财撤而新之。求记于余。”([6]: pp. 1-2)庆元六年(1200)仙都观遭遇火灾，祠庙建筑尽成灰烬，巨石崩裂，唯独《麻姑仙坛记》石碑尚存。那么，本应秘藏于府库之碑何以重现于麻姑山之中？考证历代《南城县志》，“颜鲁公祠”条中明确记载：“在麻姑山仙都观十贤堂内，宋绍兴二十七年知军事胡舜举建，元季毁于兵。”([2]: p. 66)宋绍兴二十七年(1158)，胡舜举于仙都观中十贤堂内建造了颜鲁公祠。

由此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原碑在唐末两宋时期的流转脉络：唐末五代之际，原碑仍藏于麻姑山内；北宋初年迁至府库中；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8)，因颜鲁公祠的新建，《麻姑仙坛记》原碑重归于仙都观；庆元六年(1200)仙都观大火，碑石于火灾中奇迹存留。后至元明之际，关于原碑流传及损毁问题存在诸多歧义。据吴澄《跋赵子昂书麻姑坛碑》载：“颜鲁公《麻姑坛碑》，在吾乡。旧碑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体浸失其真。”([7]: p. 434)吴澄(1249~1333)作为临川崇仁(今江西乐安)籍的元代大儒，其地方权威性不容忽视。结合前文所述，原碑南宋时期确存于抚州南城(今江西抚州)麻姑山，而吴氏所述“在吾乡”应为临川崇仁(今江西乐安)。鉴于蒙元南下过程中江西地区战乱频发之情况，地方重要碑刻由南城向崇仁转移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此观之，吴澄所言原碑于元初遭雷击损毁重刻之说可信度较高。明代谢士元又言：“颜碑刻于唐大历六年，鲁公篆文，纪山迹也。石膩书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间。永乐初，为蓟州卫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纪元，其子泰献于府，遂什袭藏之，盖欲其可久也。”([7]: p. 431)其中，“元季兵燹，流落人间”之说虽与蒙元战争背景相呼应，但是“永乐初，为蓟州卫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是否确为大字原碑尚存疑问。

3. 《麻姑仙坛记》小字本的出现

欧阳修《集古录》载：“右小字《麻姑坛记》，颜真卿撰并书。或疑非鲁公书，鲁公喜书大字。余家所藏颜氏碑最多，未尝有小字者，惟《干禄字书》法最为小字，而其体法与此记不同。盖《干禄》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此所以惑者疑之也。余初亦颇以为惑，及把玩久之，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公不能书也。故聊志之，以释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书。”([8]: p. 160)欧阳文忠于治平元年(1064)所书跋语，乃现存历史著录中有关于《麻姑仙坛记》小字本的最早记载。其通过对家藏颜体碑刻，指出《干禄字书》与小字《麻姑仙坛记》存在明显笔法差异——前者结体宽博舒展，后者则显刚劲精炼。此外，其虽初疑非鲁公所作，但经反复鉴察其笔法细节后，终认定非颜真卿不能为之。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赵明诚于《金石录》中所言：“右唐《麻姑仙坛记》，颜鲁公撰并书。在抚州。又有一本，字绝小，世亦以为鲁公书，验其笔法殊不类，故正字陈无已谓余：‘尝见黄鲁直，言乃庆历中一学佛者所书。鲁直犹能道其姓名，无已不能记也。’小字本今录于后，使览者详其真伪云。”([9]: p. 232)据赵明诚《金石录》中对于陈师道所言的转述，可知黄庭坚不仅否定小字本为颜书，更具体指认其出自庆历年(1041~1048)某位佛门学书者之手。这一记载较欧阳修题跋约晚六十年，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鉴定结论。结合二家之所言，不免产生疑问：其一，小字本《麻姑仙坛记》是否确为颜真卿所书还是后世依

据《麻姑仙坛记》原碑翻刻而成？其二，若为翻刻，究竟是何时出现？据此，本文认为需从文献学与书法史双重角度加以审视。

考诸颜真卿生前所书碑刻，《元次山碑》《八关斋功德记》《颜氏家庙碑》等典范之作皆以大字楷书示人，未见有同碑异体、特书小字之情况。此现象或与唐代碑碣制度相关——在官方纪功、宗教祭祀等庄重场合，碑铭书写必以官定形制尺寸为标准，断无同文分书、大小二体之理。但仅因上述缘由断定小字《麻姑仙坛记》并非颜真卿所书，实属牵强。《麻姑仙坛记》的撰书绝非普通的地方性书写，而是融合了个人信仰、唐玄宗对于麻姑山的推崇等文化背景，具有政治书写意涵的书写实践产物。那么，大历六年(771)颜氏若于同时撰书大、小字《麻姑仙坛记》，定会在唐代时便有所记载，而不至于从宋人题跋中窥见小字《麻姑仙坛记》的“真实身份”。由此可以推断，《麻姑仙坛记》小字本并非出自颜真卿之手，乃后人据原碑翻刻而成。

那么，翻刻本究竟出自何时？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建立起正统文化体系，其广泛收集王羲之书法，致使右军书学独尊一时，彼时书家对于颜真卿书法的接受及师法是极为有限的。至欧阳修于治平元年(1064)首录小字《麻姑仙坛记》时，距颜氏书丹已近三百年，其间文献记载的断层现象令人存疑。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小字本乃“历中学佛者所书”(1041~1048)的论断，与欧阳修的鉴藏活动存在时间上的重叠。综合上述信息，可以推测小字本《麻姑仙坛记》出现于北宋初期，而北宋中期或许是小字本集中制作的重要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书坛普遍崇尚萧散简逸得书法风格，为时人却对于颜氏雄浑庄重的楷书推崇备至，并将其缩摹成小字且不断翻刻呢？关于此现象，或许要从社会文化背景和书法审美变迁等角度进行分析、推测。从政治背景上看。北宋仁宗时期由于“庆历新政”(1043~1045)的施行，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儒学思潮的复兴，使得书法品评发生了一定转向——由技法论向道德论，由形式美转向人格美。颜真卿及其书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士大夫群体通过重塑颜真卿“忠烈书风”来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化认同。其次，从书学审美上看。宋代书学普遍以“二王”为其学习典范，而“二王”书迹又多集中于《淳化阁帖》(992)之中。那么，倘若想要打破世人皆宗法“二王”书学的学习路径，则需要重新审视并选定新的学习“目标”。此时，政治背景的转变使得“以人论书”成为了书法品评的主流。颜鲁公因其人品、才情、学问、修养，备受推崇，其书学成就遂被推至继“二王”之后的第二座高峰。然而，颜氏传世楷书多为大字，罕见小字，如何师法其小字书风便成为了宋人所关注的重点。颜真卿逝世已逾两百年，真迹难寻，那么将其《麻姑仙坛记》原碑缩摹为小字，进而制作出小字刻石、拓本，便可弥补这一遗憾。随着不断翻刻，世人对其小字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迟疑逐渐转向了接受、学习乃至推崇。最后，从书写媒介上看。由于造纸技术的成熟与印刷术的发展，宋代刻帖极为兴盛。《淳化阁帖》(992)的出现使得民间对于这一形式争相模仿，私家刻帖之风由此盛行。加之文人书斋文化的兴起，宋代文人“案头金石”的审美需求直接促使时人将具有庙堂气象的《麻姑仙坛记》原碑翻刻成小字本，以此将其引入书斋——既保留了原碑的庄严法度，又契合了文人案头赏玩的雅趣。在此背景下，小字本可视为由抚州地方官署与汴京刻书作坊合作生产的“文化商品”，以此满足文化市场对颜氏法帖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所谓“历中学佛者所书”([7]: p. 430)的论断，或隐含了其对商业刻书侵蚀书学正统的批判，其指认的“学佛者”，或许正是参与商业刻经的写经生群体。

4. 《麻姑仙坛记》小字本版本考

考究历代文献，笔者所见小字本《麻姑仙坛记》的版本主要有：南城本、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刻本、玉兰堂刻本、季膺刻本(章田刻本)、俗工摹刻本(藩益王重刻本)、玉版刻本、“具鞭”本、黄肇龙刻本、北京龙安寺本。下文将结合相关历史著录对各版本的风格特点略作考述。

4.1. 南城本

明代著录中已见对南城本的记载。都穆在《金薤琳琅》中引吴澄之言：“《麻姑碑》在吾乡，旧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体浸失其真，被焚者乃临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无恙也。”([7]: p. 431)其认为《麻姑仙坛记》大字原碑损毁于元代，而南城小字本原石于明代尚存。藩益王朱祐滨亦云：“抚州南城县旧有颜鲁公《麻姑仙坛碑》，后分南城入建昌，碑随入公廨，闻为一守橐之归，而命俗工摹一碑于郡，今所相传者是也。余广访宋拓，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阴卫夫人等书，一一并留，不差毫发，临池者尚鉴余之苦心哉。”([7]: p. 431)藩益王所言“旧有颜鲁公《麻姑仙坛碑》”实为南城小字本原碑。互参季膺万历乙酉(1585)六月题识：“郡之旧迹碑阴，有唐卫夫人、褚河南、虞永兴、欧阳率更、薛稷、柳河东、李北海诸小楷，可与公仙坛并传者也，因并刻之。”([7]: p. 431)可进一步确认，南城原石碑阴处有卫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柳公权、李邕七家小楷，此为南城本重要特征。

此外，清代张廷济多次论及小字《麻姑仙坛记》。其言：“欧书碑搨最旧者最肥；颜书碑搨最旧者最瘦。此《小字麻姑仙坛记》系南城原刻断本，笔法谨严，而较他断本为少瘦，是真原刻之最旧者。……余家有南城真本三，以此为最旧云。”([10]: p. 78)又言“麻姑仙坛记小字本，行列如此严密而庄重，端凝不作单弱之笔，有泰山严严气象，且笔势仍宽绰有余，铢黍中具寻丈之势，非鲁公谁能辨此。谓庆历中人伪书，谬也。此石是南城旧石，固不待言”([11])。张廷济所见为“断后本”，该本布局谨严，笔力雄浑，气势恢宏，故力驳黄庭坚“庆历伪书”之说。

有关南城“断后本”的记载，杨宾《铁函斋书跋》及唐石题跋亦有详考。其中，杨宾在《跋旧拓建昌麻姑坛记》中称：“此建昌原石，非万历间章田重刻本也，而纸墨亦旧。丁亥夏六月得之金陵吴氏。《小字麻姑记》余家有四本，原无出此本之右者。子孙其宝之。”([12]: p. 50)《跋石公断本麻姑坛记》中载：“《金陵琐事》云：‘姑碑为建昌府库吏所跌，万历年间季膺诏工章田重刻。’则今日行世大抵皆章本也。此本古意宽绰，与陆氏家拓相同，而断痕犹在，其为跌后本无疑，无怪乎省吾之宝之也。临摹一通，跋数语归之。”([12]: p. 10)唐云于大石斋题跋更为精审：“南城小麻姑仙坛记原刻本向不多见，世所见者大都从越州石氏本摹出，文氏停云馆亦然，南城本书法方朴雄厚，结字宽博，气势磅礴。……南城本原刻第十八‘乃浅于往者’之‘往’字‘彳’部首撇笔回锋向上。翻刻本则直撇而下。此本纸墨古色盎然，神采奕奕，拓墨虽略掩字口，无伤精神，且第五行‘色旌旗’之‘色旌’二字未泐，真宋拓南城原刻本无疑，可宝也。”([13]: p. 2)此段题跋不仅详述版本特征，更从笔法细节论证真赝伪，极具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著录多集中于南城“断后本”，而南城“断前本”风貌究竟如何？据前文所考，小字本原碑应出现于北宋初期，北宋中期或为小字本的集中制作时期。据此，则可据北宋文献推知。欧阳修《集古录》载：“右小字《麻姑坛记》，颜真卿撰并书……盖《干禄》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此所以惑者疑之也。余初亦颇以为惑，及把玩久之，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公不能书也。”([8]: p. 160)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跋〈麻姑坛记〉》亦云：“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发，然后为尽。如以此字与《中兴颂》参校，当知余言为信。”([7]: p. 430)从上述记载中可知，欧、李二人所评小字本笔法精严、气势紧结，且未言石碑断裂之事，故可推断二人所见应是南城“断前本”。较之“断后本”，“断前本”气韵贯通，法度完备，传世稀见，实为珍贵。

综上，南城本(图2)为宋拓本，碑阴处有卫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柳公权、李邕七家小楷。其笔法虽属小楷，然具大字气象，结体宽博，气象恢宏。根据石碑保存状况及拓制时间，南城本可明确分为两大类型：其一为南城“断前本”，以欧阳修、李之仪所载为代表。碑面完好，字口清晰，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其二为南城“断后本”，以张廷济、何绍基鉴藏为代表。虽石已断裂，然神完气足，笔势宽绰有余，明代以后流传渐广，成为后世研习颜体小楷的重要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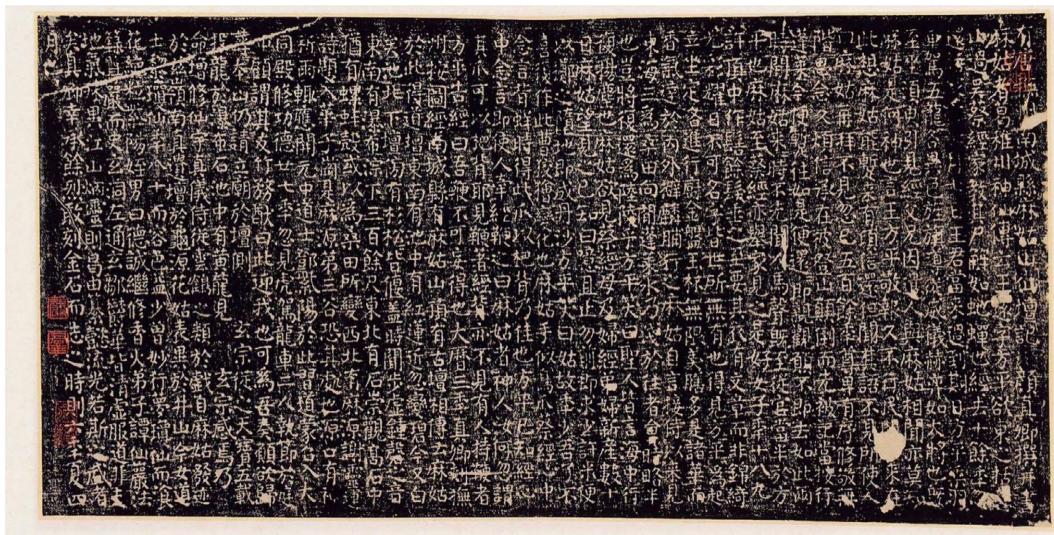


Figure 2. Song Dynasty Rubbing of The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detail),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图 2. 宋拓《麻姑仙坛记》(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2. 越州石氏本

何绍京题跋见于何绍基家藏《小字麻姑仙坛记》三种合册中第三本后, 其云: “前二刻俱唐刻原石, 虽时有先后, 均宋拓可宝。后刻乃越州石氏本, 亦宋拓之极者, 近亦罕见矣。今夏余复得原石大字、小字各一, 稠密极精, 淳是宋拓。有陆谨庭、潘榕皋诸公题跋。小字本后缀麻姑山仙坛小画, 不着款, 笔意酷似梅花古衲。曾屡经兵火而不口于难, 神物自有神护也。近复得一指顶单行本, 拓甚旧而非《忠义堂》石, 且字类褚不类颜, 与杨龙石所宝之宋拓指顶本毫发无异, 余疑是宋人临本耳。咸丰元年仲冬(1851)大通州子愚何绍京识于自娱山房。”[14]可见, 除南城本外, 越州石氏本(图3)亦为宋刻本。

此外, 诸家在越州石氏本与南城本的风格韵味上多有辨析, 所见各异。何绍基于丁酉(1837)年跋云: “《小字麻姑仙坛记》, 余所见原石墨拓数十年来殆近十番, 要以此本为第一无上妙品。山谷老人所睹本殆未必过之也。自文摹本出, 扁锋取态, 作俑者乃《越州石氏》耳。……近见宋拓《越州石氏》本, 为《停云馆》所自出, 犹远逊此本也。”[15]: p. 896明确指出越州石氏本笔锋扁平, 笔意上已偏离原石风貌, 实为明代停云馆刻帖的祖本。张廷济于道光十六年(1836)比较南城本与越州石氏本时言: “顷得《越州石氏刻》真本, 视此少肥, 各有胜处, 皆艺林墨宝也。”[10]: p. 783张氏认为越州石氏本较南城本略显丰润, 二者虽风格略异, 然皆属艺林珍品。此评较为中立, 未分高下。唐云指出小字本多出自越州石氏一系, 并批评其笔力虽存雄健而失古朴韵味, 字形结构已见松懈, 气象格局亦逊于原石。其言: “南城小麻姑仙坛记原刻本向不多见, 世所见者大都从越州石氏本摹出, 文氏停云馆亦然, 南城本书法方朴雄厚, 结字宽博, 气势磅礴。越州石氏本则雄而不古, 结体松懈, 气短势弱。”[13]: p. 2

总言之, 越州石氏本为宋代重要翻刻本, 是文氏停云馆刻本的祖本。该本在笔画形态上趋于扁平, 结体略见丰润, 虽出自宋工, 然在古朴之气、雄浑之势上较南城本已有较大差距, 体现出了翻刻过程中笔意损耗与时代审美渗透的双重影响。

4.3. 停云馆刻本

停云馆刻本(图4)系明代文徵明所摹刻, 其底本出自越州石氏本, 为明代中期以后流传较广的小字《麻姑仙坛记》重要版本之一。张廷济于道光三年(1823)题跋中详述其所见: “右《小字麻姑仙坛记》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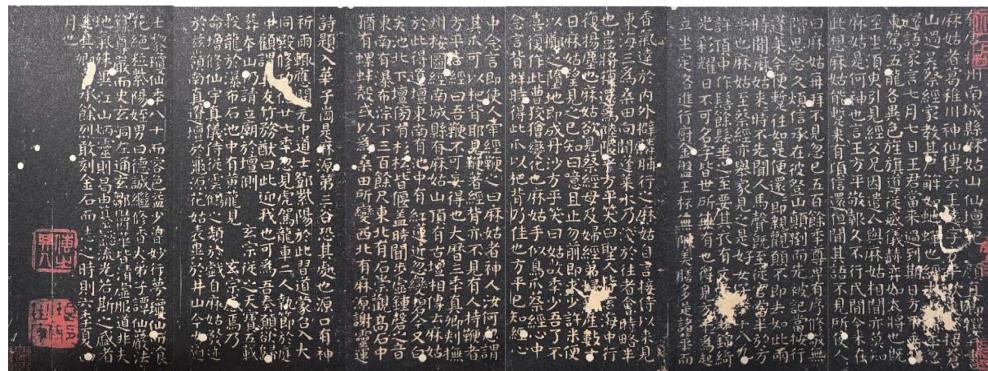


Figure 3. Engraved copy from the Shi Family of Yuezhou

图3. 越州石氏帖刻本

《停云馆》原刻初拓本，三十年前丁字溪南王禹九上舍鼎所贻。字迹较南城断本为少肥，然行间茂密，宽绰有余。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长洲之视建昌，未应多让。况《停云》原刻，文归钱舟壑司臬朝鼎，继归毕秋帆制府沅，今在冯鹭庭太史集梧家。小楷书率多重摹，若此旧拓，不得不璠玙视之也。”([10]: p. 783)张氏指出，此本字形较南城断后本略为丰润，然行气茂密，格局宽博，认为长洲文氏摹刻本不逊于建昌原石。同时，更详述该本的递藏脉络：自文氏始，经钱朝鼎、毕沅，终归冯集梧收藏，可见其在清代已被视为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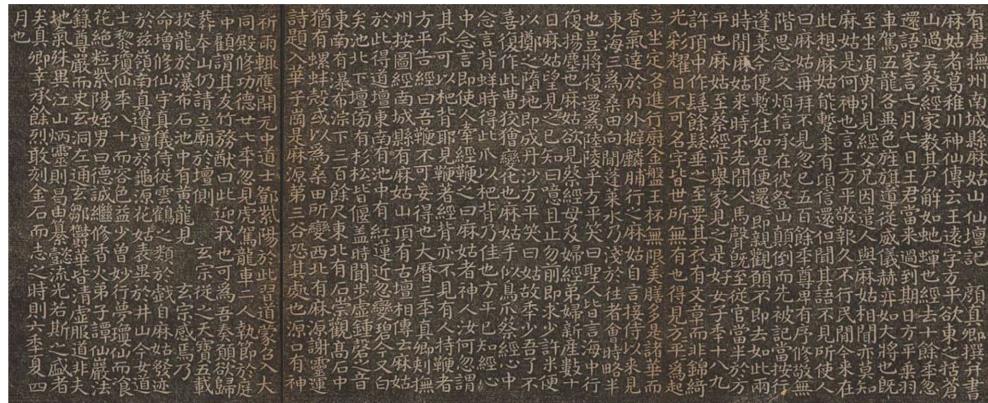


Figure 4. Engraved copy from the Tingyun Guan Model Calligraphy

图4. 停云馆帖刻本

4.4. 玉兰堂刻本

玉兰堂刻本为明万历年间姜氏玉兰堂所摹刻，属于明代后期翻刻系统之一。“玉兰堂”为文徵明之斋名，姜氏或与偶同或袭用之([16]: p. 42)。陈威指出：“此明万历间玉兰堂摹刻本也，碑尾原有‘万历庚寅云易姜氏玉兰堂摹勒上石’一行隶书，此本已脱，盖裱时截去之矣。碑上左角裂文，以之模仿南城原石而不似，病在曲而不直。阅此一忘，而知其为仿作也。”[17]据此可知，该本试图模仿南城原石断裂痕迹，然笔画曲势失真，未能逼真，因而易被识别为后摹之本。

4.5. 季膺刻本(章田刻本)

关于季膺刻本之由来，罗汝芳记曰：“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学宫，见旧墨圣座东偏，爰委仙

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蹊樵竖于涧底拾出碑版，字迹犹无恙，先君以其奇遇，辄珍袭一幅。”([7]: pp. 431-432)明洪武初年(1368年后)，建昌府修建学宫时曾于殿东发现旧碑，遂委仙都观道士立于殿隅。至正德年间(1506~1521)，樵夫于山涧中拾得碑版，字迹尚存，罗父因感此奇遇遂珍藏一拓。又言：“后碑入郡中，渐就剥裂，观者每为怅快。兹郡公雁山季先生将图翻刻，而莫获善本，得是册，色喜，遂命工入石，郡人罗汝芳书。”([18]: p. 133)可知，小字原碑后被移入建昌府衙，日渐损泐，直至季膺任内主持翻刻。

季膺于万历乙酉(1585)六月所作题跋可与之相印证：“仙都观坛即蔡经故居，王方平来会仙人蔡经之处。颜鲁公记其事，手书入刻。往在京师见一旧本，笔法奇劲，精采焕发，当时购之不得，后十多年来守建昌，此刻匣贮郡斋，启视之，石方广盈尺，中断，字多磨灭不可辨，为之慨然。偶过近溪罗大参所出藏书本，点画波发与京师所见豪发不差，何异龙剑之合，遂传之以传。郡之旧迹碑阴，有唐卫夫人、褚河南、虞永兴、欧阳率更、薛稷、柳河东、李北海诸小楷，可与公仙坛并传者也，因并刻之。”([7]: p. 431)季氏任建昌知府时，于官署所藏木匣中得一小字刻石，石长宽不过一尺，已从中断裂，字迹多已磨灭，且后刻七家小楷。因其笔法奇崛刚劲，与罗汝芳所藏珍本点画波磔极为类似，遂借罗汝芳所藏拓本摹刻之，且将碑阴七家小楷一并重镌，此即“季膺翻刻本”之由来。

有关章田重刻版本，今人著录中多以“章田重刻本”称之，然而考究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章田所刻亦受季膺之请，故何碧琪等人所指“章田重刻本”([19]: p. 111)应正名为“季膺翻刻本”。

4.6. 俗工摹刻本(藩益王重刻本)

明藩益王朱祐滨于重刻碑跋中详述其源流：“抚州南城县旧有颜鲁公《麻姑仙坛碑》，后分南城入建昌，碑随入公廨，闻为一守橐之归，而命俗工摹一碑于郡，今所相传者是也。余广访宋拓，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阴卫夫人等书，一一并留，不差毫发，临池者尚鉴余之苦心哉。”([7]: p. 431)可知，小字旧碑因行政管辖变动，迁至建昌府官内，后遭官员私自离开府衙，仅命普通工匠摹刻一石置于郡中，世称“俗工摹刻本”即为此物。为存原迹风貌，藩益王广搜宋拓，聘请良工精摹重刻，并原样复制碑阴诸家小楷，收藏于府，是为“藩益王重刻本”。

《跋〈建昌小字麻姑帖〉》中另载：“壬午春见孔东塘家小字《麻姑记》，碑阴有赵松雪临卫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李邕六人书。东塘曰：‘此益王所刻建昌府碑也。’今此帖得自建昌，又帖尾有褚书，其为益王本无疑。然比之孔本则又缺卫、虞、欧、薛、李五种书，而多一记柳，岂别有故邪？抑装拓之不全邪？”([12]: p. 19)可知孔尚任家藏“藩益王重刻本”拓本，其碑阴有赵孟頫临六家小楷，唯缺柳公权之书。值得注意的是，何碧琪在《〈石渠宝笈〉所载〈麻姑仙坛记〉相关问题》([19]: p. 111)一文中将孔尚任家藏本定为“孔尚任藏本”。然本文认为，该本实为“藩益王重刻本”之拓本，碑阴独少柳河东小楷极有可能是在拓印或装裱时的疏漏所致，故不足以将其视作为独立的版本系统。

4.7. 玉版刻本

陆之垓《跋〈右麻姑仙坛记〉》中称：“右《麻姑仙坛记》，相传宋元间已零落不可摹，明初玉版复续，当世咸诧异之，知为神物之呵护也。兹本乃先曾祖藩宣江右时所购，时支给官库一金。后刻纷纭，而嘉禾项氏颇得其概，然神采远矣。……时康熙改元(1662)仲夏三日，西吴陆之垓记。”([20]: p. 2)其言小字《麻姑仙坛记》原碑于宋元时期已残，至明初乃有玉版刻本出现，时人视若神物。其曾祖曾购得一本，虽后世翻刻众多，然神采已逊。叶奕苞《金石录补》中亦载：“右碑高六寸，广尺许，相传为玉版，可怀袖。唐颜鲁公真卿撰书，共九百余字，字甚小，有寻丈之势，为鲁公正书第一。”([7]: p. 432)叶氏所言“可怀袖”即为“玉版刻本”的最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玉版”之称或受元明时期“玉版兰亭”之影响，反映出时人对法帖形制与材质的审美偏好。

4.8. “具鞭”本

王澍于《虚舟题跋》中言：“余所得犹是南城元本，为新建裘鲁青所遗，以较大字，精神结构无毫发异，惟见‘鞭著经背’作‘具鞭’、叠字皆作‘二’，为小异耳。颜鲁公书，大者无过《中兴颂》，小者无过《麻姑坛》，然才小虽殊，精神结构无毫发异，熟玩久之，知《中兴》非大，《姑》非小。”([7]:p.435)王氏认为其所藏裘鲁青所赠南城原石本与大字本精神结构毫无差异，唯一区别为“鞭著经背”写作“具鞭”，此为“具鞭”本名称之由来。然而，何绍基家藏《小字麻姑仙坛记》三种合册中第二本后的题跋却提出异议：“虚舟谓小字本见‘鞭著’作‘具鞭’，今视此及南城重本均不然，不知所据何本。”[14]何氏检视自藏本未见“具鞭”写法，对王澍所据版本来源存疑。张维屏亦持相似观点，其跋云：“《麻姑山仙坛记》有大小二本，小本多覆刻，此本为云谷农部友石斋所藏，展玩久之，遒劲繁结，诚如欧公所云：‘非鲁公不能书也’。‘见鞭著经背’，此本是‘见’字非‘具’字，以文意推之，当以‘见’为是，虚舟跋南城原本乃谓作具何耶。”张氏从文意的角度论证“见”字为妥，质疑王澍“具鞭”之说是否确为原石面貌。由此可见，“具鞭”本虽见于著录，然其真实性在清代学者中已有争议。

4.9. 黄肇龙刻本

黄肇龙刻本在学界论述较少，主要见于地方志记载。《道光南城县志》卷十七载：“《麻姑仙坛碑》抚州刺史颜真卿登麻姑山撰《仙坛记》手书小楷，镌于石，高不满尺，长尺余，笔法奇劲，精彩焕发。碑阴附刻卫夫人、褚河南、虞永兴、欧阳率更、薛稷、柳河东、李北海诸小楷，悉称神品。益藩潢南道人记云：‘为一郡守橐之，归爰访宋拓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今不可观矣。’又万历乙酉太守季膺自称于近溪罗大参处得睹本镌之以传今。据罗近溪记云：‘正德中，山溪樵竖于洞底拾出，其碑版字迹犹无恙，后入郡中渐就剥裂。郡公雁山季先生翻刻行世，然历年既久，仍归乌有。’乾隆甲戌(1754)，郡守黄肇龙访得原拓善本，中有裂痕，命工镌石，镶嵌仙都观殿上。”([21]:p.257)县志中对于小字《麻姑仙坛记》碑阴小楷记录极为完善，又引明代藩益王、季膺及罗汝芳等人摹刻事迹，记载了乾隆十九年(1754)知府黄肇龙访得带有裂痕的原拓善本，命工重刻之事。“黄肇龙刻本”可视为清代中期地方主持翻刻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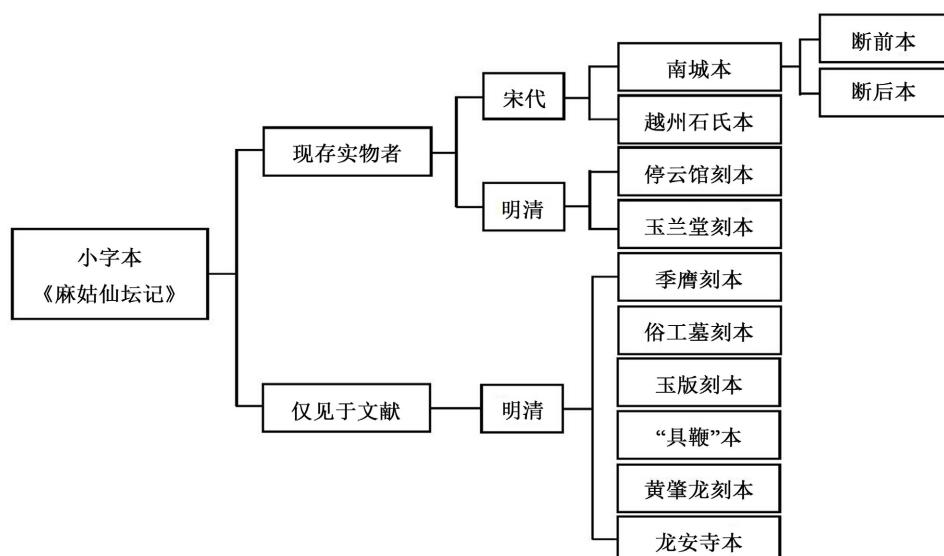


Figure 5. Ten edition systems of the small-character The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document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图 5. 历史著录中所见十种小字《麻姑仙坛记》系统

4.10. 北京龙安寺本

杨宾《铁函斋书跋》中有两则题跋涉及北京龙安寺本，一言“此北京龙安寺本也，不知何年何人刻，较停云馆、玉烟堂差小，而奇古则过之”([12]: p. 16)，二言“《小字麻姑坛记》，余旧所见者四：一在从弟石公所，二藏吴门陆氏，皆不知所从出，一在余家，为北京龙安寺本，然皆非建昌也。此本得之张平州中丞家，相传为其尊甫澹明方伯官豫章时所拓，而断痕犹在，则真建昌元本矣。何以秀润有余，奇古未足，翻出陆氏本下耶？尚有待于世之知之者”([12]: p. 18)。杨宾曾藏此本，虽刊刻时地及刻工现已不可考，且其形制较停云馆刻本、玉烟堂刻本略小，但胜在气韵奇拙古朴。

5. 结语

历代著录中记载的小字《麻姑仙坛记》版本系统纷繁(图 5)，可考者主要包括南城本、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刻本、玉兰堂刻本、季膺刻本(章田刻本)、俗工摹刻本(藩益王重刻本)、玉版刻本、“具鞭”本、黄肇龙刻本、北京龙安寺本。依据现存状况，上述版本可划分为两类：其一为迄今仍有实物传世者，如南城本、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刻本、玉兰堂刻本；其二为仅见于文献记载而实物已佚者，如季膺刻本(章田刻本)、俗工摹刻本(藩益王重刻本)、玉版刻本、“具鞭”本、黄肇龙刻本、北京龙安寺本。此类失传版本虽无实物印证，但可从明清以来的题跋、方志、书论等记载中窥其摹刻源流、基本形制与艺术特征，对于全面梳理小字《麻姑仙坛记》的版本谱系与传播历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清)黄本骥. 颜鲁公全集[M]. 上海：上海仿古书店，1936: 5.
- [2] (清)南城县志卷三[M]. 清康熙十九年补修本.
- [3] 张毅, 于广杰. 宋元论书诗全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
- [4] 祝尚书. 曾巩集[M]. 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20.
- [5] (宋)周必大. 周必大集校证 3 [M]. 王瑞来, 校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6] 曾枣庄, 刘琳, 主编. 全宋文[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7] (唐)颜真卿. 颜真卿集[M]. 黄本骥, 编. 凌家民, 点校.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 [8] (宋)欧阳修. 集古录跋尾[M]. 邓宝剑, 王怡琳, 注.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 [9] (宋)赵明诚. 金石录[M]. 济南：齐鲁书社，2009. 04.
- [10] 张小庄.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 下[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
- [11] 2015 年北京东方大观拍卖《旧拓小字麻姑》册内题跋[Z].
- [12] (清)杨宾. 铁函斋书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13] (唐)颜真卿. 颜真卿小麻姑仙坛记[M]. 上海：上海书店，1990.
- [14] 何绍基家藏《小字麻姑仙坛记》三种合册中第三本册内题跋[Z].
- [15] (清)何绍基. 何绍基诗文集[M]. 龙震球, 何书置, 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1992.
- [16] 张伯英. 张伯英碑帖论稿 3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 [17] 郭若愚旧藏, 李日华、万寿国等九家题《小字麻姑仙坛记宋明拓本四种合册》内题跋[Z].
- [18] (明)罗汝怀. 罗汝怀集[M]. 赵振兴, 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2013.
- [19] 何碧琪. 《石渠宝笈》所载《麻姑仙坛记》相关问题[J]. 中国书法, 2016(6): 110-120.
- [20] 上海书店出版社. 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四种[M]. 上海：上海书店，2013.
- [21] (清)南城县志卷二,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Z].